

听马悦然谈中国文学

曹正文

马悦然的“四川情结”

10月18日，我在网上获悉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唯一精通汉语的著名汉学家、瑞典皇家学院院士马悦然先生在斯德哥尔摩逝世，享年95岁。

翌日，接到流沙河夫人吴茂华从成都打来的电话，她也刚知道这一消息，她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正在医院治疗的流沙河先生。她说，流沙河今已88岁，因患老慢支住入医院，现在嗓音沙哑而无法说话。过一天，她又告诉我，流沙河还是从新闻中获悉异国好友去世的消息，脸上显出伤感的表情。据吴茂华说，马悦然有很浓的“四川情结”。

马悦然年轻时对中国特别向往，24岁的马悦然领到瑞典大学的一笔奖学金，于1948年来到成都考察与研究四川方言。记得流沙河曾对我说过，马悦然当时常去成都文庙后街的“一峰草堂”，与中国书画家吴一峰和曾任重庆大学校长的陈行可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陈行可为了让二女儿陈宁祖学习英语，请马悦然当了女儿的外语教师。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相恋了，于1950年结为夫妻。马悦然娶了这位中国妻子之后，也自认是成都人的女婿，几十年来他与四川的情感日益加深，他曾用中文写下了一篇《另一种乡愁》。2007年11月30日，受到四川作家车辐与诗人流沙河的邀请，年已83岁的马悦然飞赴成都，参加“吴一峰百年诞辰画展”，可惜吴一峰本人已于1998年去世。据吴



马悦然在其书斋接受本文作者的采访

茂华回忆，他们几个谈得特别开心。后来，马悦然与流沙河等四川作家一直保持着联系。吴茂华说，她听说马悦然走时很安详。

听吴茂华这么一说，我眼前顿时浮现出马悦然院士的音容笑貌，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瑞典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只听其声，未见其人，还以为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在讲话。

初见马悦然

1997年夏天，我由王元化先生推荐，接到瑞典外交部发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第九十七届诺贝尔奖颁奖仪式。12月2日，我从上海经法兰克福转机飞赴斯德哥尔摩，于12月3日凌晨见到了

马悦然院士的学生、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教授。

在诺贝尔奖颁奖前夕，我参加了第九十七届诺贝尔奖的10位获奖者与各国记者见面招待会，还出席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达里奥·福的演讲会。在这个演讲会上，听说马悦然院士也在场，但我没有见到他。

12月10日，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于下午五时在瑞典皇家音乐厅举行，在那天会上，我第一次在18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见到马悦然院士，感受到这个世界盛典的庄严隆重而又激动人心。瑞典外交部诺曼司长在会前曾接见我，并微笑对我说：“本届诺贝尔颁奖仪式只允许50名各国记者进入大厅，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

200名记者在场外观看大屏幕电视。中国政府有两名记者受到邀请进入会场，您是其中一位。”

如此近距离见到马悦然院士，却未能与他交谈，甚为遗憾。12月13日，我终于接到瑞典外交部通知，马悦然教授约我于12月14日赴他府上做客，这一消息令我兴奋异常。

马悦然的书斋

走进马悦然院士的家，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高1.82米的73岁老人，他腰板挺直，头发灰白，红光满面。他穿了一件白衬衫，系一条黑色的领带，一身蓝灰色西装，十足绅士气派。马悦然微笑地请我在客厅内坐下，便去倒咖啡。我环视四周，这个客厅与两个大书房相连，仿佛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有意思的是，这位瑞典老人的书橱内有许多我早已熟悉的书，如《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尚书》《史记》《庄子》《荀子》等古籍，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大中国古典小说，以及唐诗宋词的各种版本。

我先代王元化先生向马悦然院士致以问候，马悦然家的墙上正挂着一幅王元化先生的书法作品，这令我感到十分亲切。马悦然向我问起王元化先生的近况，又谈起了他40多年来与中国作家的

交往，如老舍、沈从文、柯灵、曹辛之、叶君健、艾青、冯至等。谈到当代较为年轻的作家，马悦然对张贤亮与莫言很有好感，他说，他俩的作品正日益引起欧洲人的阅读兴趣。

我们又谈到了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院士站起来，引我走到他的书架前，取出《水浒传》《西游记》给我，我发现这两个外文版，是马悦然翻译的，他翻译的还有几本中国作品的英文版，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现代文学《边城》《绿化树》《城南旧事》《俳句一百首》，他说：“我翻译过老舍的小说，可惜他不幸去世了，如果他能活到80年代，他一定是诺贝尔文学奖最优秀、最有竞争力的竞争者。”说罢，他递过一本由他翻译的老舍小说《普通病房》。

他还谈到中国文学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不说其他文学作品，单就唐诗宋词与《红楼梦》的价值，就足以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之林的高峰。”他又补充说，中国今天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不少，但还需要有好的翻译家，他说他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马悦然指着一排书说：“我组织人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还主编《中国文学及其社会背景》等书籍，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及其作品的价值。”

这位瑞典文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每天除了坚持写作与翻译，还坚持散步一个小时，他说，我能走得到的地方，决不坐汽车。最后送我出门时，他挥挥手说：“我要去散步了，祝你在瑞典的采访一切顺利。”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要将我的《音乐欣赏十五讲》重版，要求在书中的每一条注释后面添加引文的页码。这是2003年出版的一本旧书，当初是作为通识讲座的一种，我并非学音乐的专业出身，勉为其难，仓促上阵，书写得很不规范。如今，16年过去了，重新找回当年曾经查阅过的那些书籍，犹如重拾旧梦，真非易事。

让我意外的是，那些书大多数是当年自己买的，居然都还在书架上，虽已经尘埋网封，却并未相离相弃。重新翻阅旧书，如同老友重逢，别有一番滋味。发现其中引用最多的是一本叫作《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的书。想起这本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琉璃厂荣宝斋对面不远的一家专门卖音乐书籍的书店买到的。这家书店很小，被左右两家店铺挤在中间，像一块茯苓夹饼。但是，它里面销售的有关音乐的书籍不少，这是我买到的其中一本。

这是一本1982年的旧书，作者是保罗·亨利·朗格，译者张洪岛。说老实话，当时见识所限，我并不知道这本书，也没听说过这本书的作者朗格和译者张洪岛，是书名吸引了我，让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它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已经有几十年的光景，纸页粗糙，业已发黄，定价只要二元一角。现在想来，真是恍然如梦。如今，为添加注释页码，不由得重新翻看这本已经破损封面和被水浸湿印渍斑斑的书页，依然兴趣盎然，还有新的收获，不禁想起桑塔格说过的话：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

这本书的原名为《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原书一共20章，《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翻译的是原书的最后六章。集中在19世纪。书名起得比原书名要好，将朗格以

重读朗格

肖复兴

文学和文化为背景和底色书写音乐史的特点彰显。起码对于我这样一般的音乐爱好者，这样截取的断代史，比从猿到人的写法，显得更接近，更亲切。21世纪之后，我国出版过这本书的全本，书名恢复原名《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但是，不如这本旧书影响大。

这本书囊括19世纪几乎所有欧洲重要的音乐家，论述了浪漫主义时期从发生到鼎盛到衰微的全过程。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家，朗格既论及他们的作品，又不囿于作品，而是放在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进行比较，在前后发展链中进行考察，其褒贬臧否，显得格外举重若轻，很多地方颇有见地，而不是一般的音乐鉴赏辞典，也不是学究式的学术术语的列阵驰骋。对比一些音乐史，如《牛津音乐史》或朗多尔米的《西方音乐史》等书，朗格的这本书，更为吸引我。

他批评柏辽兹，一针见血，毫无扭捏：“缺乏对于精神事物的理解，他没有沉思冥想的能力……他的管弦乐队没有一刻停歇。它经常在变动，从这一种色彩到另一种色彩，有时清澈而优美，有时则粗糙而庸俗。”

对于大名鼎鼎的李斯特，他说：“进行着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技师、哲学家，音乐学院院长以及僧侣等多种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妨碍了他的艺术达到成熟所需要的平静。因此，他的作品是不平衡的，伟

大的作品很容易为许多应时之作所掩盖。”这样的批评，至今依然具有现实的警醒之意。

也有表扬，比如他高度评价瓦格纳，说他的作品“是一种剧院的语言，它不适宜狭小的场所，它是一个民族的声音，日耳曼民族的声音”。

他说德彪西的“音乐反映了世纪转折时期的过度敏感、坐卧不安、心慌意乱、分裂的精神状态，但是它却摆脱了那个时代所激起的强烈的情热，泪汪汪的多愁善感和嘈杂的自然主义”。

前者，他着重于瓦格纳音乐的民族地位；后者，他着重于德彪西对浪漫主义晚期艺术弊端揭竿而起的意义。朗格说得都高屋建瓴，颇有拨云见日的感觉，而不纠缠一般的作品演绎。

最有意思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于19世纪音乐两位保守派的评论。一位是布鲁克纳，朗格开门见山指出其是一个矛盾体：“布鲁克纳的艺术是纪念碑式的，但又是墨守成规的……严肃但又朴素，深幸但又常常是不幸的。”他进一步分析集中在布鲁克纳身上和作品中的这种矛盾的价值和意义：“像他这样完全不合时代的艺术家是少见的，但是像他这样集中地反映了其时代的善与恶的艺术家也同样是少见的……他试图清除浪漫主义强加在音乐上的音乐以外的文学成分。”我见识浅陋，没有见过曾经有人这样剖析



朗格著《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一九八二年版

布鲁克纳的。

另一位是勃拉姆斯，朗格极其肯定地说：“这位浪漫主义最后阶段的大音乐家，是在舒伯特之后最接近古典时期诸音乐家精神的。他的艺术像成熟的果子，圆圆的，味甜而有芳香。谁想到甜桃会有苦核心呢？写下《德意志安魂曲》的这位作曲家看到了这伟大的悲剧——音乐的危机。他听到当代的进步人士的激昂的口号‘向前看，忘掉过去’，而他却变成一个歌唱过去的歌手；也许他相信通过歌唱过去，可以为未来服务。”唯新是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有诱惑力的；而“向前看，忘掉过去”的口号，对于我们更不会陌生。从这样两个方面，朗格强调了勃拉姆斯的意义，今天重读，并不过时，仿佛是朗格贴近我们的耳语。

重读朗格，不仅让我重温19世纪欧洲音乐史，也让我重新审视和面对如今的音乐和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当下的艺术，期冀我们拥有更多对于艺术纯洁而热情的信仰者。